

蘇俄新五年計劃的改革性

呂

律

壹 引言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五年計劃指示，強調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是建立在俄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三月和九月兩次全會決定的基礎上，而不說是根據七年計劃的失敗經驗和俄共新綱領對一九七〇年的要求，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它要造成一種印象，使國內外提高對這個計劃改革性的注意。

新五年計劃的改革性，是不容否認的，改革幅度之大，也是戰後幾個五年計劃（包括七年計劃）所未有過的。新五年計劃所標榜的改革，雖然大別可分為原則性方面的和政策性方面的，但是不論那一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加速從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向共產主義過渡，為了建設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而不是表示要背棄馬列教條，改變方向，走往資本主義。

貳 原則性的改革

研究蘇俄經濟的人一般都知道，在蘇俄的國民經濟中有一些一定的比例，這些比例的形成，是直接以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為依據，同時，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內容，決定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經濟規律，首先決定於它的基本規律。蘇俄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和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生產）之間的比例及工業中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和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生產）之間的比例。

關於工業中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的比例問題，過去一直是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快於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這種情況被認為一種不變的規律。因為俄共認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發展的規律，是擴大再生產的經濟規律，這一規律的基本要求是使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超過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俄共所以要把工業中的比例作如此規定，是基於一項理由，這就是生產的擴大和社會產品的增加，主要取決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話，就祇有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

在「一九五三年俄共中央九月全會以前的幾個五年計劃」，蘇俄國民經濟中工業與農業的比例，永遠是農業的發展速度要慢於工業的發展速度。自從俄共中央九月全會（一九五三年）以後，因為要力求實現該次全會所通過的「進一步發展農業措施」方案，自第六個五年計劃起開始提高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但是與新五年計劃相比，則又相形見拙。

新五年計劃的指示規定，使農業的發展速度接近工業的發展速度，據柯錫金在報告本案時說，「國民經濟已經達到的發展水準，有可能在新五年計劃中規定大大提高農業的發展速度」。柯慶這句話的含義是說，過去蘇俄的農業發展速度慢於工業發展速度，那是為了貫澈俄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一種

生產（我們用A-1來代替）和製造消費資料生產（我們用A-2來代替）。其苛細到如此程度，或許有人以為太過，殊不知俄共從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上出發，在A-1的內部還要分出製造生產工具的部門與非製造生產工具的部門，因為鑑於生產工具在所有生產資料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現在新五年計劃指示規定「使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接近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這是說，不但A-1內部製造生產工具的部門和第一部類中A-1與A-2之別，因為這個指示標榜「保證加速發展消費品生產」已無嚴格劃分的必要，而且連工業中優先發展第一部類生產的規律，也因此作了修正。

柯錫金在其報告中曾特別指出：許多年以來，人民消費品的生產在速度方面顯著的落後於生產資料的生產，現在，則已有可能使工業內部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接近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不過他說：「加快人民消費品的生產速度，保證的方法是將生產資料生產方面供應直接與發展人民消費品生產有關各部門——也就是農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貿易、住宅建設，為人民服務的文化—生活各部門——的生產資料生產增加一倍，建立穩定的供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用的原料基地，提高重工業產品總量中消費品生產的百分比，特別是在機器製造業和化學工業方面。」

柯錫金認為新五年計劃中最大的特點，將是：完善工業各部門的結構和改進內部的比例，優先發展更為進步的和更經濟的部門和生產單位，提高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技術重新裝備各部門的比重和保證新的更完善的產品生產各部門的比重；轉變工業走向更充分滿足農業需要和竭力擴大出產人民消費品。他再一次強調改變比例關係的重要性說：「在全部工業產品總產額增長四七—五〇%的情況下，甲組（即第一部類）的產品生產應當增長四九—五二%，乙組（即第二部類）的產品生產應當增長四三—四六%，前一個五年期間，甲組工業品的產額增長五八%，乙組祇有三六%，所以，在這個五年內將在國民經濟的比例方面發生實質的改觀。」

蘇俄新五年計劃的指示開宗明義就聲明，這個計劃是建立在俄共中央三月和九月兩次全會決定的基礎上，這就是說，一九六五年三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的「進一步發展農業緊急措施」和九月全會通過的「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和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的改革案，都是要由新五年計劃來分別予以實現，而其中關於經濟改革案尤為國內外所關切。

然而新五年計劃如何來實現俄共的經濟改革政策，是不是全部改革的構想統由這個五年計劃予以實現，換言之，這個五年計劃究有多少改革意義，這是每一個研究蘇俄經濟的人所一致注意的問題。

俄共新五年計劃的指示規定：「在不斷實現黨關於完善計劃工作、生產經濟刺激、擴大企業自動性和經營自主性，提高勞動者工作成績物質鼓勵的基礎上，去改進國家的經濟領導，保證中央的計劃領導與發展各工業企業主動性和經營自主性的正確結合。」為達到此目的，這個指示指出三個要點：一、俄共中央對經濟計劃的領導，首先集中在完善主要的國民經濟比例、改進生產佈局和發展全國各經濟地區方面，保證高度生產和供應最重要產品的速度，實行國家在技術進步、投資、勞動報酬、價格、利潤、財政和信貸方面的統一政策，有效運用生產基金、勞動、材料和天然資源的經濟監督；

二、必須毅然決然的改進物質技術供應制度，並且籌備逐漸用批發貿易的途徑向有計劃分配設備、材料和半製品方面過渡；

三、完善生產管理方法，並提高製造廠、工廠、工地、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其他企業中計劃—經濟工作的水準，而為了這一點，又必須不斷的實現列寧的經濟核算原則，始終不渝的擴大各企業權限和經營自主性，發展它們的主動性，首先用各集體在社會利益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成果物質鼓勵的方法，提高各企業完成計劃任務和契約的物質責任，提高各項經濟槓杆在經濟刺激方面的作用，全力發展社會主義競賽，並且提高精神刺激的意義。

以上，是新五年計劃要負責實現俄共九月全會決定的一個總綱。從這個總綱裏，我們不難看出，要實現俄共經濟改革的全部構想，保證中央的計劃領導與企業主動性和經營自主性正確的結合起來及提高經濟刺激的作用，實居於最主要的地位。

要能保證中央的計劃領導維持不墮，同時還要做到擴大各加盟共和國、

各經濟地區以至各企業的權限和經營自主性，並且發展它們的主動性，也就是說在做到不放棄中央集權，同時實行地方分權的情況下，要不發生不切實際的領導和尾大不掉的流弊，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新五年計劃的指示在規定工業企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全力發展經營自主性和管理方面的民主原則時，意味深長的提出：「在擴大管理方面的民主原則、提高生產集體在管理企業方面的作用時，必須教育每一個工作人員對勞動具有共產主義的關係，對待人民財產有節儉的觀念，鞏固生產紀律和國家紀律。」

柯錫金在報告本案時，說到這一方面，特別指出：「各加盟共和國的五年計劃，應當以每一個共和國的特殊性和可能性為出發點，規定加強和完善各共和國之間的經濟聯繫，並且顧到蘇俄一切兄弟民族的利益」。除了不發展本位主義，要顧到他人之外，還要不發展地方主義，顧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他說：「每一個共和國在發展自己的經濟文化時，應對解決全聯盟的任務提供最大限度的貢獻。」

加強生產的經濟刺激，在俄共看來這是實現經濟改革全部構想，是蘇俄經濟從搖搖欲墮的狀態再行立穩腳根，從而發展繁榮起來的一種具有關鍵性的手段。

不過需要加以澄清的，一般往往誤認經濟刺激，就是物質鼓勵，其實，經濟刺激之中包括有物質鼓勵，而物質鼓勵絕不能代表俄共所謂的「生產經濟刺激」。

依我個人從蘇俄經濟改革前後各項有關資料方面記錄下來的，所謂經濟刺激，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 一、加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經濟核算制；
- 二、強化利潤的觀念，加強各企業爭取利潤的任務；
- 三、提高各企業的盈利率；
- 四、提高利用生產基金的效率；
- 五、限制國家基本建設投資不歸本還原的情況；
- 六、實行收回固定基金和流轉資金的辦法；
- 七、放棄由國家預算開支的無報償的各企業追加的流轉資金，必要時以信貸取代；
- 八、從無報償的指撥基本建設資金的情況下過渡到長期信貸。

九、擴大採用信用貸款的辦法；

十、改進價格構成；

十一、加強完成交貨義務的物質責任；

十二、加強各種運輸因不能及時運出及拖延運交的責任；

十三、規定規劃設計機構和人員應對規劃設計工作發生之錯誤負責；

十四、加強支付紀律，及時繳款，及時付清貨款；

十五、依靠利潤提成建立生產基金、社會—文化設施和住宅建設基金、工作人員物質鼓勵基金；

十六、建立鼓勵制度；

十七、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工資；

十八、提高集體農民從公有經濟項下所得的收入；

十九、評定企業的活動（業務）成績，不以生產量、銷售量為準，而以利潤之多寡為準；

二十、實行工業企業同貿易企業之間及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同貿易企業與採購機構之間的定貨契約制。

我們從上列二十個經濟刺激的形式中，已可一目瞭然的看出，有物質鼓勵性的祇佔四分之一，尤其要注意的，這些鼓勵形式的基礎建立在其餘的四分之三的上面，尤其是建立在利潤刺激的上面。各企業和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所得的利潤愈多，物質的鼓勵就愈大，但是達到利潤愈多的目的並不是僥倖可以做到的，是有條件的；也就是要由能不能實現其他的經濟刺激來決定。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從柯錫金的報告中隨便就可以找到很適當的例證：

一、柯錫金在談到工資問題時，他說：「現在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在頗大的程度上將取決於該企業產品生產的成果——產品銷售額的提高，產品品質的提高，利潤率的提高。」

二、柯錫金在報告農業計劃時，他說：「提高農業工作人員在更好的利用固定生產基金和增加產品生產，在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在節約利用物質技術和貨幣資金方面的物質鼓勵。」

三、在談到勞動報酬時，他說：「我國的勞動報酬政策，主要是不斷提高在解決五年計劃最重要生產任務方面的刺激作用，必須將始終一貫提高工

賽同優先鼓勵在發展和完善生產方面，貢獻最大的工作人員正確的結合起來。」

四、在報告農業計劃談到集體農民的收入時，他說：「各集體農莊的收入提高，將為每一個集體農民由於農莊活動的經濟總結果而增加收入造成可能性，這點，對於廣大的集體農民羣衆在提高公有生產、提高它每個部門的盈利率方面，是一項刺激，將加強社會主義農業集體農莊形式的經濟基礎。」我們隨便從柯錫金的報告中所找到的四個例子，它們除了可以作為我的論斷之佐證外，更給我們造成一項印象，即俄共的政治藝術與衆不同，它不採曲線的「欲取先予」，而是採取直線的「先取後予」，至於這種刺激和鼓勵形式是否為蘇俄的工人和農民心甘情願的接受，則有待事實證明。

我們相信上述二十個經濟刺激形式，在新五年計劃中必將全部予以實行，或許更多，但是新五年計劃的指示中（甚至於將在不久之後提到最高蘇維埃審議的正式五年計劃中）並未全部一一提到（事實上也沒有一一提到的必要），所提到的，不過是某些具有啟發性的刺激形式而已。

關於盈利率和利潤，新五年計劃指示規定：「在技術進步，完善勞動組織和改進勞動條件，加強生產經濟刺激和勞動者物質鼓勵的基礎上……力求各企業盈利的工作到五年終了，將工業中的利潤增加一倍。」提高盈利率是增加利潤的當然一步，至於如何才能提高盈利率的水準，這個指示必須大大改進設備的利用和提高設備的生產率，才能求得產品生產的增加，提高盧布生產基金盈利率的水準。柯錫金在報告本案時強調說：「由生產基金項下所得到的最大報償（乃指銷售產品的數量、質量和利潤而言），應該是每一個企業工作評定的重要條件之一，必須在擬定各企業五年計劃時決定盈利率的水準。」

其次，關於由利潤提成而形成的社會—文化設施和住宅建設基金的運用問題，新五年計劃指示規定：「依靠社會—文化設施和住宅建設基金，擴大為各企業工人和職員建築住宅」。——柯錫金在報告增進人民福利問題時說，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住宅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除提高建築住宅的中央基本建設投資外，應該廣泛利用各企業社會—文化設施和住宅建設基金。」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注意的，此項基金並非業已建立好，並且已有雄厚的積累閒在那裏無用，而是要開始建立，從爭取利潤入手，由利潤提成來形

成。

不論是「指示」，還是柯錫金的報告，比較起來對於物質鼓勵方面發揮的最多，譬如，「指示」中規定：「依靠各企業過渡到新的計劃工作和經濟刺激所構成的物質鼓勵基金，提高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員的勞動報酬，實質的在工資中提高獎金和一時性的獎賞的比例，同時保證更澈底的將每個工作人員的利益同企業集體及整個社會的利益打成一片。依靠此項來源提高的勞動報酬，將可做到每一個集體或個別工作人員在發展生產和提高生產效率方面所作的貢獻愈大，則所得到的愈多。」

柯錫金的報告，對於「指示」中關於物質鼓勵的規定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在這個五年內，勞動報酬的增加，工作人員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將依靠兩個來源：依靠集中在國家手中的物資，還依靠愈來規模愈大的將要留在企業中作爲形成物質鼓勵基金和社會—文化設施及住宅建設基金的那一部份（利潤）。」又說：「在各企業中成立物質鼓勵基金，將有可能加強全體工作人員在改進企業工作總成果方面集體性的關懷，因此，新五年計劃規定在工人和職員的工資中提高獎金和一時性獎賞的百分比，這樣，就有可能更好的將每一個工作人員的利益同集體及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顧到勞動生產率、工作質量、個人和集體生產成果的獎勵制度，應當隨着採用新刺激制度逐漸的擴大到全體各部門的工作人員。」

最後，關於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直接聯繫，加強契約的作用，也是俄共新五年計劃指示和柯錫金在報告中發揚最多的一點。俄共的指示規定：「全力發展並且加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同採購機關的契約關係，提高雙方關於計劃採購和超計劃商品產品採購完成契約義務的物質責任；擴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同工業企業以及貿易機構，特別是產品易於腐壞的貿易機構的直接關係，以便及時供應消費者。」關於這一點，柯錫金在報告中說：「新五年計劃中規定，將擴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同各工業企業和各商店的直接聯繫，這將有可能在運蔬菜、水菓、瓜類作物和其他產品到消費地時沒有損失，用好的和新鮮的產品來改善對人民的供應，減少採購的開支，而予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少額外的收入。」又說：「最近時期已在工業方面實行貿易機構定貨的作法，這個作法已提供了肯定的結果，應當普遍來推行，這樣將有可能加強貿易對人民消費品生產、品類和品質的影響。」

肆 結論

總之，我們根據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對新五年計劃所作的指示看來，這個計劃確實是一個改革性頗大的計劃，它的改革雖然可分為原則性的與政策性的，但是它們都是相輔相成的和互為表裏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

這個計劃的改革活動已開始，當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舉行時（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據柯錫金報告大會說，「已經有許多大型的企業和為數達

三〇萬工人和職員過渡到新制度上了。在第二季（即本年四—六月——作者）還要有一大批企業過渡到新制度上，它們擁有七〇萬左右的工人和職員。

此後，就要開始將機器製造業和食品工業、紡織工業某些部門加以過渡，在一九七〇年初（也就是今年一年——作者）過渡到新制度上的工人和職員總人數，將為工業從業人員的三分之二左右。」至於工業中其餘的部門和其餘三分之二的工人和職員將在何時過渡到新制度上，柯錫金雖未作進一步的說明，但我們從大勢看去，假如實施的情況是順利的，所得到的結果是滿意的，此項改革確能得到人民的合作，工業方面其餘的部門和其餘三分之二的工人和職員可能就在這個五年計劃期間過渡到新制度上。

我們知道，工業，祇是蘇俄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部門，工業整個過渡到新制度上，也不過是國民經濟中一個主要部門過渡完成而已，此外尚有農業、運輸業、建築業和服務行業各部門，這絕不是在這個五年計劃之內可以與工業同時進入新制度上的。

不過，工業是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關鍵性的部門，倘使在這個五年計劃期間蘇俄的工業整個順利過渡到新制度上，其結果也很圓滿，這無異已為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的過渡創設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的條件，到下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其他部門的過渡時，就易於着手了。

然而，蘇俄此項改革是不是能貫澈到底，是不是能成功呢？要答復這個問題也並不困難。

首先，此項改革並非任何必須一貫奉行和不得違棄的馬列主義經典，即使馬列主義的經典，我們知道，已一再經過修正，而今幾乎已成為一個名存實亡的空殼。問題在於以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為首的政權是否能維持到此項改革全部實現，如果不能，中途而去（如同黑魯曉夫一樣），誰也不敢保

證繼他們之後而來者不像他們一樣，恐怕也要步他們的後塵將他們的改革措施一一廢止、推翻和取消，如同他們對待黑魯曉夫的情形一樣。

其次，要看此項改革是否真能使人民得到改革的實惠，即使是從「先取後予」的方式中所得的實惠也好。能，就可以貫澈到底，就有成功的可能；不能，就不必等布柯二人下台以後由其後任來加以推翻，他們將用自己的手來擋他們自己的嘴巴了。「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一條中國政治哲理，即使是馬列再生，也無法加以否認的。

除此之外，我們知道，一件事開始不難，如何繼續下去不易，在進行的途中有很多是可以事前想到的，譬如，工人、職員和農民的收入增加以後，購買力強了起來，工業和農業是不是能有足够的消費品配合他們的需要呢？一旦發生不能和沒有的情況，其後果如何，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還有些在事先想不到而變出非常的，譬如，在明年或後年又發生比一九六四年更惡劣的天災，或者，國際上發生一種劇變，這都是要使此項改革受到嚴重的打擊，甚至於中道而廢。

蘇俄這個政權是從許多多挫折失敗中長大起來的，它的經驗已够相當豐富，它對此項改革的最後結局，到目前為止尚未提出一幅清清楚楚的畫面，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它祇放下一顆伏子——始終不渝的加強國防威力，這就表示它對此項改革能夠貫澈到底，或者能够得到最後勝利，並未具備最後的信心。

最後還有一點也值得一談。蘇俄此項改革，它最後的成功固然需要多種適於它發展的客觀條件的配合，更需要有健全的主觀條件的憑藉，在完備健全的主觀條件未建立起來以前，即使有最充分最良好的客觀條件，亦無濟於事。那麼蘇俄的經濟改革是不是已具備了完美健全的主觀條件呢？從柯錫金的報告中我們知道還沒有具備，他說：「在當前的條件下，要對我國的經濟學人們提出一些新的更高要求。——科學家們必須探討新條件下許多關於經濟方面科學規劃和管理的一些迫切問題，關於這一方面，要求深刻而全面的研究經濟過程中和準備在改進經濟建設作法方面有科學根據的建議。」

總之，蘇俄的經濟改革，從開始到最後完成，是一段極為複雜——隨時都可能發生問題，隨時都可能中斷的艱苦歷程，俄共雖然開始在行，但是對於可能出現的遠景緘口不言，並非絕無原因的。